

# 陶渊明诗文对二疏精神的承传与升华

尹玉珊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摘要:**陶渊明不仅关注自然,更倾心于历史,这点深刻影响到他的诗文。在诸多为陶渊明输送养料的历史人物中,二疏(疏广、疏受)的地位不可替代。陶渊明田园诗中描述饮酒的习惯用语及其蕴含的历史深意,是受到“二疏散金”一事所体现的“放意余年”与“有子不留金”精神的影响。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与表达回归主题的田园诗所开创与定型的“归去来”人生主题,也得益于他对二疏在辞官返乡中“知止”精神的提炼与升华。

**关键词:**陶渊明;疏广;疏受;精神;承传;升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6)03-0130-06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与《饮酒》作为其田园诗作的代表,表达了他在隐居生活中对农村景物的喜爱与欣赏,充分体现了诗人“新自然”的思想。因此,前人读陶诗也多重视其中与自然的联系,即使能留心挖掘其中所蕴藏的历史潜台词,往往也不能摆脱传统的政治譬喻,得出一些牵强的结论。其实,正如范子焯所言:“陶渊明并非现实和历史的局外人,也并非一个机械的记录员和超然的观光客,因为他在远离尘嚣的同时,还始终把自己镶嵌在现实的社会之中和既往的历史之内。”<sup>[1]</sup>这种对陶渊明文化本质的精准概括源于对陶诗的还原解读,即陶诗语句的自然、平和仅仅是一种表象,表象之下无不包涵有现实与历史的深意。因为陶诗具有的历史与现实的立体特性,他从“种豆南山下”一诗中探寻到陶渊明与杨恽的联系,从“结庐在人境”一诗中挖掘出陶渊明对扬雄的呼应。

但是,汉代的二疏作为一对给予陶渊明思想、生活实践以及诗文创作以极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作用尚未有人深入研讨。鉴于此,笔者拟从“二疏散金”对陶渊明写作、教子的影响与“二疏返乡”对陶渊明“归去来”人生主题的影响两个方面,分析陶渊明与二疏之间的精神脉络。

## 二疏事迹的传播及其对陶渊明写诗、教子的影响

二疏指西汉疏广、疏受叔侄俩,《汉书》卷七十一:

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

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

收稿日期:2016-0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13&·ZD109)

作者简介:尹玉珊,女,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颇立产业基地，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飧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皆以寿终。[2](P3039-3040)

二疏功成身退之事曾经轰动一时，在汉宣帝年间广为人知，东汉以降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于两晋南北朝为文人再次聚焦，且尤为两晋南朝文人所仰慕。二疏返乡后散金与族人亲旧饮酒欢宴一事，也一度传为佳话。至唐代，“二疏散金”已成为经典载入儿童识字课本《蒙求》一书。对二疏事迹在两晋南北朝之后的传播，陶渊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陶氏本人也从二疏事迹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使得他所创作的田园诗饱含历史深蕴。

“好读书”的陶渊明对于二疏事迹是非常熟悉的。《陶渊明集》中有《咏二疏》一诗：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袁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钱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馀荣何足顾！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厌厌闾里欢，所营非近务。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sup>①</sup>

此诗几乎是一篇二疏的诗体传记，首尾抒发诗人的感慨和论赞，中间综述二疏人生三要事。陶渊明在论赞中对于二疏之功成自去、放意余年表达了由衷的仰慕欣赏之情。诗中所述事迹与《汉书》不差，应该是他熟读《汉书》的成果。

陶集中《集圣贤群辅录·太子太傅疏广字仲翁、太子少傅疏受字公子》也有关于二疏的“录”一条：

右二疏。东海人。宣帝时，并为太子师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朝廷以为荣。授太子《论语》、《孝经》。各以老疾告退。时人谓二疏。见《汉书》。

据此可知，陶渊明因读《汉书》熟悉了二疏事迹，从而心生仰慕。此录仅记二疏并为师傅一事，略去其他，是限于著作体例。《汉书》记载二疏事迹虽较简，但大致突出三点：并为师傅，东都钱别，挥金乡里。其中二疏挥金乡里的影响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有突出表现。

倾家时作乐，竟此岁月驶。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杂诗》其六）

袁行霁在《陶渊明集笺注》中也引用《汉书·疏广传》为这两句作注，说明他也注意到陶诗与二疏事迹的关系。此诗是陶渊明自述之辞，疏广的“有子不留金”显然已成为他教子的座右铭。

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此诗仅仅根据字面很难解读：“靡所挥”的是什么？它与“秋稼”有何关系？袁行霁《笺注》中对“每恨靡所挥”中“挥”释为“举觞饮酒”，如此，则与后一句中“待秋稼”的意思便非常吻合了。袁注的确精准，但尚有思考空间：陶渊明为何要用“挥”来表达“举觞饮酒”之意？这个词不像是真实的饮酒场景的描写。陶诗中除去此例，是否还有其他诗句把“挥”与酒紧密关联呢？笔者发现陶诗中用“挥”表述饮酒的诗句还有如下几例：

欲言无子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

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

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

这几例因为饮酒之意比较明显，“挥”在诗中明显用来写饮酒。由上述可见，陶渊明以“挥”来表述饮酒并非偶然，而是一种习惯。是什么原因导致陶渊明在诗歌中习惯性地吧“挥”与饮酒紧密联系在一起呢？经常为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借鉴的《诗经》与《楚辞》中不见一处能把“挥”与酒关联的例子，说明陶诗的这一惯例当另有出处。

陶渊明《饮酒》其十九有云：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读至此诗，思路豁然开朗：正是“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一句揭示了“挥”与饮酒的密切联系。原来“挥”一词是陶渊明从“挥金”这一固定词组中移植而来，他自道其因：因为我无太多“金”可挥，于是常借“挥”酒自慰。这就是陶诗述酒时喜用“挥”字的原

<sup>①</sup> 本文所引陶渊明作品均据袁行霁《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随文括注篇名，不一一出注。

因。“挥金事”其意非常明了,如何焯《义门读书记》说: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此千载心期也。[3](P984)

逯钦立《校注》云:

挥金事,李注:张协《咏二疏》诗云:“挥金乐当年。”按疏广归老以后,酒食游宴,用金甚多。[4](P99)

袁行霈《笺注》称:

意谓虽不能如疏广之挥金取乐,但聊可凭浊酒以自陶醉也。张协《咏史》:“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汉书·疏广传》:“广上疏乞骸骨,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5](P196)

几代学者都从此句诗发现了陶渊明与二疏及张协的联系,也发现了正是借酒挥金的二疏最早让陶诗中的酒与“挥金”之事发生关联。原来,“挥”在陶诗中之所以与饮酒结缘,是陶渊明对二疏事迹接受与改造的结果,而张协的《咏史》一诗在二疏“挥金”与陶氏“挥酒”之间起到了媒介作用。

张协《咏史》专门谈论“二疏散金”事,而且诗人最终也效仿二疏“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6](P1519),与二疏大概也可算是“千载心期”了。他的《咏史》诗云:“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7](P745)第一次出现“挥金”这对词组。“挥”一词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疏广对乡人的慷慨和对金钱的潇洒态度,张协的生动表达为陶渊明所欣赏、借用,而再变为“挥觞”、“挥杯”、“挥酒”。

至此,陶诗中“挥酒”一说与二疏的渊源关系清晰可见。但“二疏散金”对陶渊明的影响不止如此,何焯所云陶渊明对二疏是“千载心期”并非虚词。事实上二疏散金置酒与乡人欢宴,追求“众乐”的精神对陶渊明影响也非常深刻,以至于他独自饮酒时都要触景生情。陶渊明饮酒时偶尔也有“我有旨酒,与汝乐之”(《答庞参军》其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饮酒》其十四)、“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其一)、“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的情景,仿佛疏广当年“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的历史再现。如果总能过“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咏二疏》)的日子,那陶渊明的内心该是何等骄傲!但正如他诗中所说,大多时候他只能是独自饮酒,比如“挥杯劝孤影”

(《杂诗》其二)、“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饮酒》其四)、“静寄东轩,春醪独抚”(《停云》其一)等等,独自饮酒的情景才是他隐居生活的常态。欣赏“众乐”之饮的陶渊明在独饮时,内心泛滥着怎样的波澜哪?所以他不得不感慨“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停云》其三),而最终“愿言不获,抱恨如何”(《停云》其四)。从“挥金”到“挥酒”,既是陶渊明对于二疏精神的继承,也是自然与诗意的转变。他在借酒浇愁的同时,也无时不承受着历史的拷问与自我人生境遇的平衡与调适。

“二疏散金”对陶渊明的影响,除饮酒以及饮酒诗的写作之外,还体现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抚养子女的义务一直是陶渊明难以释怀的,其作品中一再出现的“瓶无贮粟”“屡空既有人”“箪瓢屡空”“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等等皆指父母虽在,孩子们的生活却没有保障,作为父亲自然深感惭愧和耻辱,正所谓瓶罄罍耻”[8]。他当初之所以出仕,一方面也是受制于此,但当他能让子孙衣暖食足之后,也从疏广“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的态度中总结出“有子不留金”的明智做法而最终得以解脱。

倾家时作乐,竟此岁月驶。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杂诗》其六)

诗中所述,就是对疏广“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咏二疏》)的照应。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欤。(《和郭主簿》其一)

诗中所言既是针对自身,也是教育子孙。此诗也体现了疏广的人生观:“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如果说陶渊明在拿儿子陶佟与扬雄之子童乌作比时还有一点叹其不争的无奈,当他看到疏广对子孙的期许时,是能得到安慰的,因此他才会有“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的大悟。

## 二疏返乡对陶渊明 “归去来”人生主题的影响

与“二疏散金”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二疏挂冠返乡一事。在治国上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宣帝时期,二疏在事业的巅峰期毅然离职的举动,在当时文人中产生了爆炸性的新闻效应,从《汉书》对于东都钱别场景的描述即可见一斑。二疏事迹如果不被载入史书,仅仅作为口谈佳话,在文人间的流传也不会久远。它能在新闻的热度完全冷却的两晋南北朝再度

吸引了文人目光,一方面与文人读史有关,另一方面也因此时老庄思想盛行,二疏辞官返乡的举动与两晋南北朝文人知足、止足的追求相契合。关于这一点,井上一之、李寅生在《论陶渊明〈咏二疏〉诗的思想意义》<sup>[9]</sup>一文中论述比较充分,文中所举西晋羊祜与华谭、东晋王彪之、萧梁沈约等人所追慕的都是二疏辞官。该文意识到了二疏事迹对陶渊明的影响,注意到《咏二疏》一诗所述二疏事迹的侧重以及此诗对咏史诗传统的创新,但仅仅局限于对《咏二疏》一诗进行阐发,意有不尽之处。

汪春泓《〈汉书·二疏传〉养老主题的影响及其与南朝宫体艳情之关系》<sup>[10]</sup>一文,有关于二疏事迹对文人及诗歌的影响的详尽阐述。该文也阐明了二疏辞官之举给予士人出处问题的启迪,但一笔带过,只对其中养老主题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二疏散金”为五代李瀚《蒙求》所载成为经典,与陶渊明诗在唐代文人中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无关系。笔者以为,评估二疏辞官一事给予陶渊明个人的深度影响方面尚可深挖,因为这不只影响到全面评价二疏在思想文化史上所做的贡献,也会影响对陶渊明的深刻了解。因此,我们下面针对二疏事迹给予陶渊明人生出仕、归隐模式的规划与实践,及其创作《归去来兮辞》的影响情况逐一阐发。

二疏给予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影响非常广泛,但他们给予陶渊明的影响要更加深刻。我们上文所举的陶渊明一诗一录已经证明了这一认识。从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二疏给予羊祜、华谭、王彪之与沈约的影响,仅在于为他们提供致仕的口实,那么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的人生走向,正是二疏影响的成果。

从《归去来兮辞》序言看陶渊明的辞官举动似属被动,但从本传中“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sup>[5]</sup>(P2461)的自述可见,他的出仕是有预谋的,不仅仅是为子女谋口食,也是在为自己后半生的归隐做经济上的准备。也就是说,陶渊明的出仕、归隐不是受外界所迫的一时冲动,而是受到二疏返乡启发之后的主动追求,出仕与归隐都在他的计划之中。虽然“三径”一典出自汉代隐士蒋诩,但陶渊明出仕捞金的自信无疑源于二疏。原因有如下几个:

首先,在诸多深刻影响着陶渊明思想的历史人物中,二疏辞官的自觉和不计贫贱的人际交往,与陶渊明的理想最为接近。仅就《归去来兮辞》一篇所见,他所仰慕的历史人物大致有孔子、楚狂接舆、荷蓑丈人、陈仲子、疏广、蒋诩等。从他所用典故来看,

他从孔子身上只吸收了“知退”的一面,儒家的人生理想永远不能占据他的思想和生活重心,它如同陶侃等先祖的功业一样,带给陶渊明的更多的是内心的波澜而非宁静。这些影响着陶渊明思想的人物中,先出仕再归隐的只有疏广与蒋诩,其他均为道家代表人物。蒋诩的归隐政治意味更浓,不似疏广表现为更自觉的人生追求,而且在返乡后,蒋氏只与高士求仲、羊仲往来,而疏广则是“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疏广返乡后,他们对交往对象不计贵贱等级的宽阔心胸最为接近陶渊明的追求。所以,仅就此文看,在诸多历史人物中,与陶渊明最为接近也是影响最大的当属二疏。

陶诗中(赠答诗除外)出现频次最多的现实人物是农士:田父、邻曲,诗中所谓“素心人”并非鸿儒,可能更多的是务农的“白丁”。在农民中间,陶渊明绝无高贵与孤傲之感,这一点不仅与蒋诩不同,也与后世很多故作清高的文人大不相同。所以,赋中的“三径之资”之典,陶氏仅取其隐居之义,而无标榜自己清高之意。

陶渊明其他诗文中叙写的历史人物较为丰富,除去那些未曾出仕过的隐士、农士与道家代表外,相比《归去来兮辞》还多出这样几位:三良、荆轲、陆贾和扬雄等。陶渊明所景仰的历史人物大约分两类:一类是作为精神上的审美追求,如三良、荆轲等人。这表明,陶渊明欣赏的人格风貌是丰富的,淡泊宁静与金刚怒目都能统纳到其精神世界内;一类是作为人生的榜样与模范,扬雄、二疏即属于这一类,但他所取法的轻重与多少则因人而异。扬雄虽然有归田的理想与憧憬,但不曾付诸实践。陆贾的归隐实属仕途不得意所致。因此,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的人生模式只能是源于二疏的启发,是他为自己在社会与个体的矛盾洪流中,把历史与现实相融合而浇筑成一条最适合自己的生命之舟。

其次,陶诗中无论实写还是比喻,都充满对二疏返乡的反复吟唱与赞美。如: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其七)  
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拟古》其三)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六)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

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晖。(《于王抚

军座送客》)

厉厉气遂严，纷纷飞鸟还。（《岁暮和张常侍》）

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拔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

诗中所言“好爵”，肯定不是陶渊明曾担任的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与彭泽县令等卑职，而可能是对二疏官职的描述，即使为假设之辞也含有二疏的为官作参照。“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既是自述，也正是二疏东门挂冠、荣归故里的写照。飞鸟所还的是“旧林”、“先巢”，池鱼所思的是“故渊”，就像二疏返“故乡”，自己还“旧宅”一样。他在诗中反复表达的返乡归隐后的自由与舒畅的心情，是其与二疏人生取向相同之处。与二疏不同之处在于，二疏的出仕一因“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一因“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应对，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说”；而自己的出仕是为“口腹自役”，无“生生所资”，依靠家叔而“见用为小吏”。二疏返乡是“功成身退”，不仅携金而且有“公卿大夫故人邑子”东都送行，属于荣归故里；而自己借避督邮之责“自免去职”，形单影只，仓皇逃离。两相对照，即使“有酒盈尊”，他仍不免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的苦闷。他在《还旧居》中，先是实写自己归来，最后自然过渡到二疏，其中“去还归”不就是“归去来”的另一种表达吗？

最后，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言“悦亲戚之情话”正呼应了二疏“厌厌闾里欢”的温馨。《晋书·陶潜传》中说他“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sup>[6]</sup>（P2462），正是他对二疏“所营非近务”的直接效仿。汪春泓谈及陶渊明《咏二疏》诗时说：“此作在陶诗中意义非凡，它为文学史提供了陶渊明何以出仕及归隐的思想依据。陶渊明曾出仕，做过参军、县令等小官，此莫非受二疏之影响？惜乎赐金未曾到手，却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去了。观陶渊明仕途，乃二疏之具体而微者乎？”<sup>[10]</sup>这段话揭示了二疏对于陶渊明出仕、辞官返乡的人生模式与二疏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最能代表陶渊明人生模式的宣言是《归去来兮辞》，它凝聚了陶渊明“归去来”人生模式的思想精华，也是陶渊明“归去来”人生实践的总结，使得“归去来”人生主题在文学中得以定型。

由此看来，正是二疏返乡之举给予陶渊明深刻的人生思考，决定了他的由出仕走向归隐的人生模式。也就是说，二疏返乡给陶渊明以启发，让原本在

出仕与归隐之间徘徊的陶渊明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把自己妥帖安置的生活模式，最终唱出了“归去来”这一响亮的人生宣言，并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归去来”这一人生模式的定型，是陶渊明一生思考与实践的结晶。中间虽经几次反复，但彻悟后的他一直坚守，直到生命的终点。下面这首诗，几乎可以看作一篇诗体的《归去来兮辞》，展示了他在归隐前的曲折探索：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其十九）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如同“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遂见用为小吏”；“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如同“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如同“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因为自己已经彻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所以不会再作杨朱之泣。而《归园田居》五首，是他以村居自由人的身份对乡村生活细腻详尽的描述，更是其人生“归去来”不悔选择的生动写照。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归去来”人生模式正是由于受到二疏行事的启发而逐渐变成他的自觉追求。对于二疏，陶渊明发掘了前人与同时代人所忽略的一点，即“先出仕，再归隐”，然后又加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从而使得归隐的主题得以升华，不仅炼成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田园诗人”，而且打造出“归去来”这一融合儒道的自由生活模式，为后世文人拓宽了人生道路，开出了别具特色的一种生活。

经陶渊明改造后的“归去来”模式，给予后世文人无穷的慰藉，受到他们的极力推崇。那么，其中原因何在？就在于陶渊明的辞官归隐并非建立在“功成名遂”的基础上，这是他与二疏的最大不同。因此陶氏“归去来”的魅力在于，打破了二疏所创并为世俗所认同的“身退”必须建立在“功成”这一条件之上的“知止”观。因为假如文人都追效二疏的功成身退，最终还是无法解开“不遇”这个命运死结，文人心灵依然无法从儒家的人生罗网中挣脱出来。比如，上述以二疏辞官为榜样的羊祜、华谭、王彪之与沈约等人，他们都是当时政治上卓有成就的重臣。他们的辞官要么因认同知止思想，要么为避祸，即所谓见机归隐，仅仅把归隐作为一种低俗的政治避难手腕，而非最高人生境界。陶渊明“归去来”的突破在于取

消了那个“功名”的基础,而把归隐建立在心灵解放的宗旨上,这就打破了儒教的紧箍咒,把社会人变成自在人,不用拘泥于儒家的所谓大善、小善的界定,挣脱了达与穷的纠缠。

从以上所论可以看出,站在历史与现实之中的陶渊明,时刻不忘汲取历史的营养以培育现实的人生。他对于二疏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提炼、升华,既使得二疏事迹进一步推广传播以至成为世人皆知的经典,同时,二疏事迹以及前人对二疏的评价也成为其诗文创作的思想与史料来源,促成了陶诗的历史深蕴以及陶氏特色的“归去来”文学主题与人生模式。

参考文献:

[1] 范子焯.诗意的栖居与沉静的激情——对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的还原阐释[J].文学遗产,2011,(5).

[2] 班固.汉书:第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范子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瓶无贮粟”解[J].文史知识,2012,(2).  
[9] [日]井上一之著,李寅生译.论陶渊明《咏二疏》诗的思想意义——兼论“知足”的是与非[J].九江学院学报,2012,(3).  
[10] 汪春泓.《汉书·二疏传》养老主题的影响及其与南朝宫体艳情之关系[J].文学遗产,2013,(3).

责任编辑:张玉璞

The Inheritance and Sublimation of Two Shu's spirit in Tao Yuanming's writings

YIN Yu-shan

(College of Art,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530299, China)

**Abstract:** Tao Yuanming pay attention to the nature, more go for the history, this profound influence on his poetry. In many historical figures of Tao Yuanming's writings, Two Shu's status can not be replaced. The idiom of drinking in his pastoral, and the historical meaning,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related spirit of Two Shu. In the poetry 'come back home', the subject of life which expressed by Tao Yuanming, is also refined and sublimationed from the spirit of know check in Two Shu.

**Key words:** Tao Yuanming; Shu Guang; Shu Shou; spirit; inheritance; sublimation

